

说说 我校语文类课程改革的 改革的故事

张国强

2016年是我校建校75周年，也是我与学校结缘60年。在我任职的近40年间，学校经历了由中等农校到农技高师的跨越。这40年（1956—1996年）中，虽然10年我以教学管理与职教研究为主，但一直没有离开过语文类课程的教学，担任过中专语文、大学农业写作、教师口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我校在全国业内具有广泛、良好的影响。回顾40年来我校语文类课程改革的改革，或许对应用型大学建设颇有裨益。

农业中专期间的语文教学

我校中专期间的语文教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56—1966年。这一时期（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前期），执行的是全国中等专业学校统一的教学计划，使用的是全国中等专业学校统编的语文教材，教学时数为300学时，于第一、二学年开设。这套教材以文学史为序，上册为古典文学，从诗经的《关雎》《硕鼠》到晚清小说；下册为现代文学作品，从鲁迅的《药》到周立波的《分马》节选《暴风骤雨》。还编选了部分苏联文学作品，如《海燕》《我不掉队》等。每一单元后还编写有该时期的文学概述。这套书应该说都是名篇佳作，我作为一名酷爱文学的年轻教师，讲起来津津有味，学生学起来也津津有味。但不久便得到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反馈，他们说：“不怕枪、不怕炮，就怕总结与报告。”这便使我开始醒悟，这样的语文教学，虽然增加了学生的文学素养，但却不能适应农业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要，同时按照文学史脉络进行的语文教学，也脱离了当时愈益强调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战线风云变幻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编选了若干篇毛泽东著作和报刊发表的有较大影响的时文（诸如《为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和《十二次特别快车》等），但即使如此，在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更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语文课可不幸地地被批评为“热中热、冷中冷”作为语文教研组长的我也曾受“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号。至于如何“就怕总结与报告”，当时已无人提及，坦率地讲，我也不知道基层农业工作有哪些“总结与报告”，更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二是1972—1977年。这一时期跃过了“文革”狂热的教学空白区，至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生，恢复了中断六年的语文教学。但由于学制缩短为二年，语文课时数大为减少，且无统编教材，只能选讲一些毛泽东著作和报刊发表的时文。随选随讲、随讲随学，因之无体系、无系统可言。为了适应学员参加工作的需要，也试图选编一些当时流行的应用文，例如通知、通讯、挑战书、小评论等，迈出了“总结与报告”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较多的参加了农科专业实践，例如1973年我带领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到唐山市开平区兽医医院实习；1974年我带领农作物专业学生到遵化西铺实习；1975年我带领果树专业学生到抚宁实习。与学生一起制订实习计划，编制科学实验方案，参加生产和科学实验实践，写作各类总结。这样使一个只知“关公斩颜良”的语文教师，了解教育对象的需要，粗知了农业生产、农业工作、农业科学实验的ABC，为农科院校语文教学改革的改革奠定了些许基础。

三是1978年—1993年，我校先后改建为农大分校、农技高师，中专部停止招生。这一时期结束了十年动乱，百废待兴。1978年农业部委托黑龙江齐齐哈尔农校赵珍老先生主编新时期第一轮全国中等专业学校语文教材，我应邀参加了教材的审定。应该说这套教材适应了中等农校恢复招生的急需，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水平，这套教材，还基本是文选的汇编，既无创新体例，也缺少农科学校的特点，更无学生迫切期望的“总结与报告”的问题。在执行统编教材的基础上，只有靠我们自己了。于是从1979年始我们走访了农业部众多领导和本省的毕业生，了解他们对语文的需要和常用文书种类，我们阅读了大量农业工作和农业科技期刊，从而探出各类农业文件的写作规律，并升华为“理论”；我们深入地、县等多家农业机关征集大量的各类文件，经过认真的加工，甚至改写，作为正、反例文；在此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写出一本名为《农业常用文体的写作》的小册子，印油作为语文的补充教材，在教学中试用。令我高兴的是，当我把这本油印稿寄往中国农业出版社，不到一便收到复函：“本社接受出版”。并邀请我再编一本供农民阅读的《农业应用文》。两书分别于1981年12月、1982年1月出版。《农业常用文体的写作》首印23200册，《农业应用文》首印即达63200册。据说两书，特别是

《农业常用文体的写作》是我国第一本对农业基层干部和农校学生学习写作农业文件的图书，虽然内容尚嫌粗浅，却受到基层农业干部的热烈欢迎，收到了来自广东徐闻等多地农业干部的信来感谢，有的还寄来他们写作的文件请求点评。

1982年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中等农校语文教学研讨会，我应邀与会并发言。发言中我阐述了 my 的语文教学观，介绍了我校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赞同者有之，不屑甚至反对者亦不少。赞同者认为：在打下必要的语文基础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写作农业应用类文件的教学，是教学改革急需；而反对者则认为：语文课是“基础课”，其任务就在于打好语文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则能触类旁通，而打好基础就是古已有之的文章选讲，特别对我提出的农业应用文不少于语文课时数的领导从这一争论中，洞悉了中等农校语文改革的改革方向，此后不久即启动编写新一轮全国中等农校统编语文教材。我受命参与编写组，并独立承担下册农业应用文。这套教材于1987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中册主讲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旨在打好后期的基础，下册为农业应用文，首印20000册。这是我国农业教育领域第一次把农业应用文引进语文教学课堂，学生感到亲切、有用、解渴。这里仅举一例：一个叫高晓宇的内蒙古某农校上世80年代后期的毕业生，现在北京某公司工作，毕业20多年后，仍渴盼与这本书为伴，于是几经辗转打听到我后，急切地来京求教。我只有将仅存的一本样书慨然相赠。当然是后话。

上述“文革”后的第二轮中等农校统编语文教材，在使用十多年后，大约于1990年，农业部又组织第三轮中等农校统编教材的编写。当时我已被改建为农业技术师范学院，不属于中等农校范畴，但鉴于需要仍特邀我参加。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的编委会上，议定编写三年制中专和四年制中专两套教材，分别由广东高州农校、山东临沂农校主编，我作为特邀成员名列两个编写组，两套教材共用我独立承担的下册。下册共九章，230万字，于2001年完稿。为应急需，先由农业部委托陕西内印。1994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至2000年已6次印刷，印数已达216000册。中国农业出版社在1997年4月对该书的评价是：“内容详略得当，表述准确，文笔流畅，有论述、有例文，切合实际应用，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

至此，我校经过20年的努力，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农业中专语文教材中农业应用文的建设，初步解决了农校学生“不怕枪、不怕炮，就怕总结与报告”的难题。但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中等农校语文的基础性又当如何解决呢？于是继1982年《农业常用文体的写作》出版发行和1987年教材的问世，我们又开始了语文教学基础性的探索。

说也凑巧，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又收到农业出版社的约稿函，一是1982年出版的《农业应用文》受到农村读者的欢迎，农业出版社针对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经济政策有必要增订；二是为适应农业工作者对写作的需求，邀请我们再编一部涵盖对打好语文基础到农业工作应用的著述。前者我很快完成，并于1986年出版；后者我们试图编写《阅读与写作》一书，包容从基础读写能力的培养到应用写作能力的训练的完整系列，这也可为以后新一轮中等农校语文教材的编写，探索些许途径。纵观传统的语文教材，或为文选汇编，或为写作理论阐述，形不成完整的知识序列和能力训练系列，而且多家课本大多选用那些共同欣赏的名篇，以致彼此雷同，形不成与培养目标一致的特色。中等农校的语文教材也闻不到泥土与果实的芬芳。鉴此，我们在编写《阅读与写作》中，试图在特定培养目标的映照下，体现如下构思：

▲本书基础部分以文章三种主要表达方式（记叙、说明、议论）作为主线，主要讲述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培养学生记叙、说明、议论的能力，从而为后期的农业应用文读写打下结实的基础。这是因为农业应用文中的农业新闻、调查报告等是以“记叙”作为基本表达手段的；农业应用文中的各类计划、各类农业科技室宣传资料等是以“说明”作为基础表达手段的；各类农业总结、农业科技论文是以“议论”（或称证明）为表达手段的。因为只有娴熟驾驭三种基本表达方式并巧妙综合运用，方能适应中等农校特定培养目标的需求。

▲上述三种表达方式（表现于文章中即三种文体）中，每种文体又包含诸多技法和类型。因此，我们

在每一文体中又从基础理论、主要技法到专用形式，划分为若干单元。例如议论文部分，我们划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重在讲述议论文的特点和议论的基本要素；第二单元以“立论”为主线，讲述论证方法、论证结构和论证规则；第三单元则专门讲述驳论；第四单元则在上述基础上讲述议论文的常用类型。这样每一个文体从基础理论、基本技法到专用形式，便形成一个全面、系统、完整的知识系列。

▲在每一文体的每一单元中，我们又都设置了四个教学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四个环节是：

范文研读。即选编若干篇文质兼美的范文，这些文章力求从不同侧面体现单元教学目的和知识重点，要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权威性。

读写知识。即将上述范文所显现的偏于个体、偏于局部的写作技法，加以抽象、概括和升华，形成本单元系统的读写知识（理论）。

阅读分析。即在范文研读、理论阐述之后，又选编若干篇现实性强、且接近专业的精粹短文，运用学过的理论知识和研读方法进行独立的阅读分析，这一环节既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又扩大了学生的阅读视野，增加了阅读量，为写作作好了准备。

写作练习。即运用本单元所讲述的理论知识和模拟本单元所读范文，进行本单元教学目的所要求的写作实践。

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都形成在特定教学目标指导下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完整的认识过程。对同一文体的其他单元也是一个再实践，再提高。

▲文选内容努力体现经典性、现实性、专业性相结合的原则。传统语文教材，无论大学语文和中专语文都强调经典性，而远离时代生活和专业特征。我们在编写《阅读与写作》中，讲读课文注重经典性，兼顾时代性和专业性；而阅读课文，则在典范性的基础上，注重时代性和专业性。使这本书跃动着时代的脉搏，闻到泥土和果实的芳香，从而增强了学生阅读兴趣。例如本书中册，议论文的第三个单元，重点是学习驳论的方法和原则，在精读课文中，我选编了恩格斯的《权威》、节选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谓“过分”的问题》以及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韩愈的《讳辩》等经典驳论文章；而在阅读分析课文中，我们则选编了魏巍的《生与死》、《关于苏州地区种植制度的讨论》（包括周正度等人关于苏州地区种植制度论辩的文章）、以及《关于京白梨购销合同的诉状二则》（起诉状和答辩状）。这些文章观点相悖，针锋相对，显示出反驳的锋芒，而且现实性强，读来兴味大增。

《阅读与写作》全书95万字，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主讲记叙文、说明文，并附文学常识《中国诗歌发展概述》和《关于诗歌的基本知识》；中册主讲议论文、下册为农业应用文，并附录《文言特殊语法例解》，于1987年陆续出版。

这套书出版后引起了农业工作者的阅读兴趣和专家的好评。河北省写作协会会长，在一次会议上评价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写作学著述，它突破了传统写作著述或文选或理论的惯例模式，从文选中抽象理论，又以理论指导读写，形成了知识与训练的科学系列”。

1992年农业部组织第三轮全国中等农校语文教材的编写，在江苏南通召开的编委会上，我介绍了这套书的编写体例，供承担基础部分同仁参考。1994年出版的由山东临沂农校主编的四年制中等农校语文教材上、中册，显示了与本书相似的编写体例与选文原则。如果不是借鉴了本书的编写构思，那便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至此全国中等农校语文教学的改革基本成型。我校在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上，均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业内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农技高师时期的语文类课程改革

从1972年起，我校在唐山地区农校的基础上，同时命名为华北农大唐山分校（后改为河北农大昌黎分校）。至1981年大专各系均未开设语文类课程。1982年，农学专业邀我为77级本科“大四”学生讲授农业应用写作课，反响良好。此后78、79级果树等专业本科生，也相继邀我开课。

1985年我校在河北农大昌黎分校的基础上改建为河北农业技术师范学院。1987年我由一名语文教师，改任学院教务处长。此时，不少农院校热衷开设大学语文，以文学史为序讲授名家名作。我则接受1956年中专语文的教训，从培养学生的为师资队伍、增强师范性出发，顶着一些同志的不解和误解，

提出开设农业写作和教师口语课，在全省本科师范学院尚先例的情况下，各系将两门纳入培养方案，并由我为不同年级开设。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农业写作课。为了提高农业写作课的教学层次，1985年5月，我去中国科技大学参加被戏称为“科技写作学科的黄埔一期”的科技写作研修班。聆听了知名专家讲授的中国科技史和科技写作论等课程。回来后我将科技写作的一般规律和方法移植到农业写作课中，更加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除开课程组外，我又应院学生会之邀，面对全校未开课程级的学生，每周定时开出农业写作讲座。一时成为学院的一桩盛事。每当讲座日，容纳二、三百人的阶梯教室早早就一空，不仅有学生听课，一些年轻的教师也屈尊光临。这样农业写作课1988年被评为学院教学成果奖。

我写作课的改革，在省内高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0年，为推进我省高校写作教学的改革，河北省写作学会组织全省14所高校、20多名教师编写《应用写作技法新编》一书，由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河北大学教授贾振平任主编，我与省写作学会另一副会长、河北师大教授贾振平任副主编，全书16章40万字，三位主编于1991年在我校开会审定，1991年10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校在高校课程改革中的贡献。

下面再说教师口语课的设置。1987年后，为了培养师范生的为师素质，我在既少先例，又无现成教材可参考的情况下，在省内本科师范学院第一家开设了教师口语课，并且建立了这门课程的教材系统，并逐步加以完善。为了开好这门课，我一方面努力学习口语的相关知识，并报名参加吉林师大《演讲与口才》杂志社举办的函授；另一方面，先后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部门搜集、复制、诸至演讲、论辩、说故事、朗诵等音像资料，并且采取了“四环节”教学法。这四个环节是：（一）讲理论，为实施口语训练提供理论指导；（二）视听过渡，即播放相应语体的视听资料，消化理论，提供示范，作为练习的过渡；（三）强化练习，这是教师口语课的关键环节，是由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唯一途径。在这个环节中我紧紧地把握住三个要点，一是营造口语表达环境，即练习采取全班或一、二十人的小集体进行，以提高。二是面试考核，这项环节的考核，一要检验学生前开口心理障碍。二是个体训练，即在群体环境下，一个学生进行表演和练习，以增强练习的“责任感”，防止“滥竽充数”。三是群体评价，以交流心得，共同提高。四是面试考核，这项环节的考核，一要检验学生对口语理论的理解程度，更要检验学生的口语表达技能，因此必须采取抽签面试的方法。一张试卷，既有口语理论试题，又有某一语体口语表达试题。教师视情况可随机发问。这样的四环节教学法，虽然极大地加重了教师授课的负担，但却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农业写作和教师口语课，都是在缺少法律依据，依靠对农技高师必须要师范性的基本理解的情况下自下而上自主开设的，一时也曾受到一些同志的不解和非议，但可喜的是，在我校开设农业写作和教师口语的数年后，1994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把书写规范字和书面表达能力和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技能，作为高师学生必备的职业技能的重要方面。基于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农业推广学》教育专业的师范性课程改革方案，也把农业写作和教师口语课作为必修课程列入方案下发执行。这表达了我们的探索，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为全国职技高师的课程改革提供了经验。于是全国农技高师院校纷纷开设了这两门课程。为适应开课的急需，农技高师的同仁们委托我牵头，我作为主编，在我讲过的两门课程方案的基础上，编写《农业写作学》和《教师口语学》两本教材。于是在我即将退休的时刻，又唱响“谢幕曲”，带领河北农大教师、河南职技师院、安徽农技师院、广西和吉林农大职技师院的数十名同仁，经过一年的辛苦努力，在我退休一年后编写出这两本颇具创新性的教材，于1996年6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农业写作学》全书379千字，分上、下、附三篇。上篇为总论，下篇为分论，包括农业新闻、农业广告、农业合同、农业计划、农业科普文章、农业调查报告、农业总结、农业科技论文、农业经济论文、农业科技管理文件、农业公文等11种文体。附篇为规范汉字书写。这部书引援基础写作学的共性理论，研究农业写作的个性特征，把农业一般应用写作、农业科技写作、农业经济写作、农业公文写作融为一体，既充满了泥土和果实的香气，又增强了农技高师培养目标的广泛适应性。

《教师口语学》全书351千字，分总论篇、普通话训练篇、口语基本技巧训练篇、基本语体（包括复述、朗读与朗诵、演讲、交谈、论辩、教学口语、教育口语、农业推广口语等）训练篇。

这两本教材，都是在缺少先例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填补了农技高师学生教师素质训练的空白，不仅适应了教学的急需，而且在2012年河北省离退休干部纪念建党90周年专著文集、文艺作品展示活动中，荣获二等奖。这也是我校对农技高师师范性建设的又一贡献。

我校40年语文类课程的改革对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启示

我校40年（1956—1996）语文类课程教学经历曲折而富有创新性的探索，在业内形成了具有全国性的影响。那么这40年的改革经历，对今天倡导的应用型大学建设有什么启示呢？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要勇于突破消极的思维定势。

多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类高校的同一专业大多执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或称专业培养方案），使用的是全国统编教材。近年来国家虽明确指出大学有学术型和应用型之分，但不少地方高校仍不能突破传统专业构架的樊篱，甚至仍沿袭学术型大学的课程模式“照虎画猫”陈陈相因。因此一些地方高校在应用型大学建设上，或不愿屈辱转轨，或小修小改难于有更大的建树。这便提示我们突破传统的消极的思维定势，是迈不开应用型大学建设步伐的。

二、要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专业培养目标。

应用型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每一课程内容的择定，都要瞄准专业培养目标在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诸方面的需求。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列入教学方案中的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不甚分明。一些专业课要求基础类课程要为专业类课程；而一些基础类课程则不肯屈辱就范，强调要保持本门课程完整性、系统性。其实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列入教学方案中的各门课程，都要紧密围绕专业培养目标的映照，都要充分适应专业培养目标的实际需求。为此，第一，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要根据培养目标的实际需要，控制课程门类；第二，列入教学方案的各门课程，都要在培养目标下精心择定教学内容。第三，一些课程可以打破自身完整的学科体系，甚至可以若若干门课程科学组合，形成一门新的综合性课程。例如农艺教育专业可以把阐述植物体内部生长规律所需的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化学等课程的相关内容，组合为栽培学原理（一）；将土壤学、肥料学、气象学等植物外部生长规律的相关内容，组合为栽培学原理（二）。虽说课程门类减少，但课程精华犹存，这样便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教学实践活动。

三、要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建设科学的课程运行模式。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科学论断。应用型大学的课程建设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妥善处理实践与认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理论教学或旨在阐释科学技术的原理，或为能力训练提供脚本，而把能力训练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实践与认识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在反复的实践与认识中得到提高和升华。

四、要造就一支适应应用型大学要求的教师队伍。

应用型大学的教师，不仅重视高学历，不仅要有广博的专业理论知识，更要有娴熟的职业技能；不仅是本门课程的行家里手，而且还要粗知整个专业的A、B、C。只有如此，才能站在专业培养目标的高度，正确指导本门课程的改革和运行，也才能使本门课程成为这个专业的有机、和谐、密切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只着力于本门课程的“改革”，而漠视了专业培养目标的映照，这样的“改革”或许会偏离了育人的大方向。

（后记）

本文为庆祝我院建校75周年，起笔于2016年7月，后因身体欠佳憾然辍笔。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在两次住院治疗的间隙，断续成文，作为迟到的校庆献礼。2016年底，付兴国同志同我谈起校史编写问题。我的见解是，为使校史不成为枯燥的“大事记”或获奖簿，增强其可读性、教育性和可读性，应学习中央党史撰写之前，先选定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组织亲历者撰写回忆录，成书《红旗飘》。从这种认识出发，我撰写了本文，为校史编写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

